

雨花台烈士传丛书

李耘生传

洪 欣 著

刘亚生 (1910—1948)

邓演达 (1895—1931)

李耘生 (1905—1932)

孙晓梅 (1914—1943)

侯绍裘 (1896—1927)

高文华 (1908—1931)

邓中夏 (1894—1933)

卢志英 (1905—1948)

贺瑞麟 (1909—1928)

项 英 (1898—1941)

顾 衡 (1909—1934)

夏雨初 (1903—1930)

袁国平 (1906—1941)

孙津川 (1895—1928)

朱务平 (1899—1932)

朱克靖 (1895—1947)

洪灵菲 (1902—1934)

丁 香 (1910—1932)

冷少农 (1900—1932)

许包野 (1900—1935)

施 混 (1900—1934)

邓振询 (1904—1943)

任天石 (1913—1948)

周 镛 (1910—1949)

陶家齐 (1890—1945)

恽代英 (1895—1931)

吴振鹏 (1906—1933)

何宝珍 (1902—1934)

徐楚光 (1909—1948)

陈子涛 (1920—1948)

谢文锦 (1894—1927)

陈君起 (1885—1927)

成贻宾 (1927—1949)



雨花台烈士传丛书

李耘生传

洪欣著

目 录



引 子	/001	001
第一章 农民的儿子	/006	
耕读之家	/006	
“验契”暴动	/009	
就读新学堂	/010	
第二章 初识科学民主	/014	
五四狂飙	/014	
知名学府	/017	
国文教员	/020	
同学同志	/025	
第三章 走上革命道路	/029	
结识王尽美	/029	
以天下兴亡为己任	/032	
负责济南团地委	/034	
第四章 领导济南青年运动	/038	
兴办工人文化补习学校	/038	
学生运动	/040	
高涨的反帝群众运动	/041	

第五章 走向成熟的革命者	/046
参加青年团三大	/046
风暴中的青岛	/049
为罢工工人呐喊	/053
重返济南	/058
第六章 奔赴武汉	/062
惜别战友	/062
革命高潮中的武汉	/064
为工人谋利益	/066
革命伴侣	/068
第七章 在历史大转折中	/072
白色恐怖来临	/072
临危受命到武昌	/075
震寰事件	/081
第八章 转战南京	/086
艰难恢复的南京党组织	/086
出师未捷陷囹圄	/088
往来沪宁路	/092
第九章 再赴龙潭虎穴	/096
调任南京	/096
依依不舍的亲情	/097
贫儿教养院	/099
第十章 抗日怒火	/101
发展壮大的南京党组织	/101
九一八、九一八	/105
送蒋北上	/109





南京近郊的武装斗争	/113
在群众中	/118
第十一章 最后的斗争	/121
组织遭破坏	/121
临危不惧	/123
狱中斗争	/126
凛然就义	/129
尾 声	/134
主要参考文献	/141
后 记	/143

引 子

001

1975年,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一位老党员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交给了广饶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这是一本《共产党宣言》。

1920年2月,曾留学日本、担任过浙江一师国文教员的陈望道,带着戴季陶提供的日译本《共产党宣言》,还有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的英译本,回到故乡义乌分水塘,开始潜心翻译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8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正式出版。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全译本,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初版不过一个月就发售一空。但是这个版本发生了印刷错误,封面的“共产党宣言”印成了“共党产宣言”。

这位老党员保存的,正是有着印刷错误的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版。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传播的最早、最广泛的一



广饶《共产党宣言》纪念馆

部经典。它在大城市、在知识分子中传播很广，对早期革命者的思想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但是它在偏僻的乡村出现，在贫苦农民当中传播，则很少见诸记载。这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原名乐安县，位于山东省中部偏北。1914年，因与江西省乐安县重名，改为汉时旧名——广饶县，隶属胶东道。1927年，废道尹后，直属山东省。广饶县大王镇，更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共产党宣言》出现在这里，源于它特定的环境和土壤。大王镇位于广饶县东南部，流经此地的阳河，素以“铜帮铁底”著称，清水缓流，终年不竭。1988年，著名作家李存葆在和王光明合作的报告文学《大王魂》开篇就写到这条河：“毋庸稽考州史县志，我们便断定这是一条古人开凿的泻洪河。它百尺一弯，半里一拐，斗折蛇行，艰难地由南而北蹒跚游曳，漫过一望无际的旷野，注入渤海。令人费解的是：阳河在他县他乡是那样弯曲，而在大王竟是这般笔直！阳河两岸昔有民谣曰：阳河本是九十九道弯儿，直开一道弯儿出一个县官儿。”“那时，阳河对大王特别钟情。与大王接壤的周围，或沼泽泥淖，或荒滩盐碱，唯



大王土肥水美，地灵人杰。”

历代山东人有崇文好学之风，苏东坡曾发出“至今鲁东遗风在，十万家家读书声”的赞叹。广饶县南部农村，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体验到了文化对于巩固和提高家庭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凡有条件供养子女上学的家庭，总是想方设法让子女上学读书。这里靠近胶济铁路，距山东新文化传播重镇益都较近，相对而言，人们较容易受到各种新思潮和新思想的影响，思想较为开化。同时，受历代重视教育和当地杰出历史人物的影响，这里的人们普遍具有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的传统思想和良好愿望，人们感到出人头地、光耀门楣，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让子女识字、读书，接受教育。因此，20世纪上半叶，从这里出去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等遍布省内外。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先锋，他们的家乡广饶，也成为山东最早有共产党活动的地区之一。^①

1917年，刘集振华高小曾招收了两名学生——李耘生、刘子久，两位同窗后来一起考入山东省立第十中学。他们在那接受了新思想，逐步走上革命道路。1923年，李耘生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介



观众参观《共产党宣言》纪念馆

^① 东营市档案局编：《红旗漫卷黄河口》，第14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绍刘子久加入团组织，以后两人又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到济南从事革命工作。

在十中求学时，李耘生、刘子久都曾回到故乡进行革命活动。1925年春节期间，刘子久从济南回到家乡刘集村，发展了堂哥刘良才入党，以后不长时间，刘良才又先后介绍刘英才、刘洪才、刘春山等入党，这是刘集村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第二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刘集村召开了广饶县农会成立大会。大会之后，刘集村中共党的活动渐渐多了起来。

这一时期，山东督军张宗昌忙于军阀战争和镇压城市工人运动，相对减弱了对偏远乡村的统治。当时大部分中共党员虽然加入了组织，但实际上并不懂得多少马列主义。为了尽快提高党团员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刘集村党组织从省里领来许多学习材料，分发给党团员和部分群众学习。

在这本《共产党宣言》的首页右下角盖有一方“葆臣”朱红印痕，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1923年12月15日《济南地区团员调查表》表明，张葆臣是江苏无锡人，1922年1月1日入团，后到济南工作，从事青年运动，曾是济南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主管“教育兼发行”工作。张葆臣经常和在济南的广饶籍党员李耘生、刘子久、延伯真、刘雨辉等一起学习和活动，1926年，这本《共产党宣言》通过广饶早期女共产党员刘雨辉带回家乡。从此，刘集村支部的党员们常常在煤油灯下学习《共产党宣言》，这本点燃过许许多多革命者理想之火的革命文献，便在这个偏僻的乡村经历了不平凡的近50个春秋。

从20世纪30年代起，国民党颁布了许多法令，把《共产党宣言》列为禁书之首，对保存或阅读马列著作者，加上“危害中华民国”等罪名判刑监禁。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刘集村的一座简陋民舍里，却保存着一本中国最早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党员刘世厚精心地用油纸把它严实包好，再装进竹筒里，有时埋在床铺下面，有时藏在屋山墙上的雀眼里，一次次躲过了国民党的搜查和日军的“扫荡”。1975年，刘世厚把这本书，从藏匿的地方拿了出来，仔细地把这本快散的书装订好，并在首页的左上角盖上了一枚“刘世厚印”，放进小漆匣里。最终，老人





005

中共刘集支部旧址

把这一“奇书”献给了国家。

山东广饶大王镇刘集村珍藏的这本薄薄的《共产党宣言》，对认识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在那个内忧外患的社会，从广饶大王镇走出的率先觉醒的青年，上下求索，探寻着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他们带着民族振兴希望的火种，播撒在他们经过的每一块土地上。这本传记的主人公李耘生就是这样一位青年，被《共产党宣言》指引，一生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第一章

农民的儿子

耕读之家

1905年6月2日,广饶(当时称乐安)大王镇西李村,一个普通农户家里增添了一口男丁,取名李殿龙,字云生。他就是李耘生。以后,他有过老李、老章、李立章、李涤尘等多个名字。

西李村在广饶的南部,在当时是个有350多户人家的大村子。西李村东边是阳河,西边不远处还有一条裙带河,土地平坦肥沃。

李家位于村子的西南角,有茅屋10间,其中正屋4间、东西耳屋各3间,一面土墙围成一个小院。李家是个祖孙三代务农为生的大家庭。祖父李迺田育有两子两女,两个儿子分别取名李集禄、李集祺,禄、祺,表达了这个农民家庭对子孙的美好希冀。家里祖辈务农,子弟最多只





读过几年私塾，只有二儿子李集祺在益都（青州）读到师范毕业，回到乡里教书。

1924年第30期《中国青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广饶农村的调查，反映了当时广饶农民的生活，也是李家生活的真实写照：“广饶县的人民，有十分之九是务农的，这些农民几乎完全是自作农；他们虽然不受大地主的压迫，而实在的生活，却非常艰苦。”他们的食物，“米、麦二种，仅于夏、秋二季的农忙之时有吃的，然而其中还有多半不能如此。豆类、玉蜀黍等的粗食物，是用于春冬二季无事之时的，当此时间，能够得到纯粹的豆类、玉蜀黍等，亦不过是十分之一，其余的必须加糠和菜类，至于富有营养料之食物，许多的农民，整年不得入口”。农户衣料向来皆是自织，农耕之余，以木工（作门窗器具）、草工（织席）、陶工（作砖瓦、盆）为副业。^① 和当地的其他农户一样，李家一家人起早带晚、辛勤耕作家里的10大亩（约30亩）农田，家里的长媳、李殿龙的母亲刘氏手巧，除操持家务外，还做点编织的零活，贴补家用。风调雨顺的年景，也能温饱度日。

大儿子李集禄育有三子两女，李殿龙是长子，下面一个弟弟因病夭折，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李殿龙生得瓜子脸、大眼睛，从小惹人喜爱。作为家里的长房长孙，祖父和父亲对李殿龙寄予厚望，而殿龙从小就显得懂事、聪颖，从不惹长辈生气，也不与弟妹们争吃争穿，总是爱护弟



李殿龙生家老宅

^① 刘俊才：《山东广饶县农民生活》，《中国青年》1924年第30期。

妹,不吵闹打架。当父亲下地干活回来累了,或是为了生计面带愁色,殿龙都会更乖巧听话,或是拿出吃的先给长辈,以此宽慰父亲。^①对这样懂事孝顺的孩子,家里疼爱之余,更希望他识文断字,跳出农门,将来光耀门楣。

虽然家里并不宽裕,但李殿龙7岁就被送入村里的私塾读书。当时广饶虽兴办了一些新式学堂,但点稀数少,费用昂贵,农民子弟无力就读,所以私塾教育仍在乡村盛行。私塾所设课程无一定标准,但一般用三字经启蒙,“四书”“五经”为必读书。私塾星期天不休息,放夏、秋农忙假和春假、年假。^②《中国青年》那篇广饶农村调查报告里也记录着当时当地小学生的状况:“能记账写家常信的农民很少。国民小学的学生——十岁以上的,有许多一年也不过半年在学校里,到农忙的时候,他们必须留家为他们的父兄帮忙”。

李殿龙也是一边上学,一边帮助家里干着力所能及的农活,课余到田里拾麦穗、稻穗,到河边牧马。农家孩子的生活让殿龙很早就懂得耕作稼穑的不易,更珍惜读书的机会,学习勤奋用功。

“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私塾的学习虽多为死记硬背,但还是让殿龙受到了忠孝仁义等传统文化的熏陶。

作为农民家庭的孩子,长辈的言传身教,让殿龙血液里渗透着中国农民的勤勉、朴实和善良。有一次,殿龙领着几个弟弟妹妹在街上玩,堂弟殿鳌从邻居家拿回一个小玩具,玩得爱不释手,并显摆给小伙伴们看。殿龙知道后对他说:“人家的东西,借着玩玩可以,不能拿回家,快给人家送回去。”

殿鳌不理,还是只顾摆弄着玩。殿龙有点生气地说:“这事说轻了是拿,说重了就是偷,偷是最没出息的……”看殿鳌还是不动,殿龙从弟弟手里抢过玩具,立即跑去送还了邻居。一起玩的小伙伴们有的支持

^① 邓学田回忆,南京市档案馆 4065 - 3 - 71。

^② 广饶县教育志编纂组编:《广饶县教育志》(内部资料),第 77 页,1986。



殿龙，有的站在殿鳌一边。

兄弟俩抢夺玩具的时候殿鳌挨了一巴掌，从没有被哥哥打过的殿鳌大哭大叫着向祖父告状，祖父问明了情况，严厉地说：“殿鳌该打！谁叫你偷人家的东西？”

祖父顺手从院子里的杏树上摘下些杏子，先奖励了殿龙 5 个，接着又给支持殿龙的孩子每人 3 个，同情殿鳌的则一个也没有。祖父的赏罚分明让殿龙等孩子们更明了做人要有基本的原则和是非。

殿龙做人真诚，极富正义感。对穷人家的困境充满同情和怜悯。家中的长辈经常教育孩子们要注意关门防盗，有时看到讨饭的，也叫孩子们马上关上门。有次让殿龙碰上了，就振振有词地和大人理论起来：“丐盗并非一家，关门防盗是对的，避丐就不对了。丐者乞讨是因为穷，如果他们靠自己能吃饱饭，请人家来也不见得来。对于只求果腹的乞讨者，总该给点施舍。”大人们听了，觉得殿龙年纪虽小，但心地善良，很有自己的主见，又能说出自己的道理，不由得赞许。以后乞丐上门，总会施与些饭菜。

“验契”暴动

李殿龙的童年时代，正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风雨飘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席卷全国之时。虽已是民国初年，殿龙的家乡仍在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之下，农民捐税负担不减，甚而加重。

1913 年，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为扩充实力，巩固自己的统治，着令财政部筹措军饷。财政部就想了一个“验契”的名目，规定凡民间买卖耕地和住宅没有缴纳契税的，要遵照新章程尽快完税，政府集中验契。原契约证书作废，要重新缴费换新。8 月 1 日施行，6 个月内完成。以此“合理合法”搜刮民脂民膏。

北洋军第五师师长、山东代理都督靳云鹏是袁世凯的心腹，在山东更是加紧催办。乐安县知事王文域接到政府“验契”的指令后，立即

充当起“验契”催税的急先锋。他命人在县衙门前扎起席棚，安排收税人员天天蹲守，强令百姓前来验契交税。对有漏税或不呈验者，立马押至衙前，用铁索锁在柱子上示众。

农民的各项税负本来就重，“验契”更如雪上加霜。除缴纳契费外，请首事、地保丈量土地，还要送礼“递包”，外加吏役的额外勒索，家家苦不堪言。农民大多卖地抵契，甚至弄得倾家荡产。李殿龙家也没能躲过“验契”的盘剥，家中积蓄尽数抵缴，仍不够纳税，不得不又抵出几亩地。殿龙的祖父为此气得大病一场，一家人的生活更加艰难。

而王文域年底将全县已呈验完税的税款解报省城时，竟赢得了“山东之冠”的“美名”，还收到了督军靳云鹏的“嘉奖令”。王文域受宠若惊，年后继续加紧“验契”。1914年2月23日，还是农历正月里，王文域带领一班衙役、幕僚、警卫数十人迫不及待地亲往乐安县北部碑寺口乡“验契”，激起东齐村民众反“验契”暴动，王文域被愤怒的村民打死。

“乐北戕官案”轰动全国，先后有30多人因此被捕入狱，其中有14人被判处死刑。官兵将他们枭首示众，先悬于村内，后悬于乐安县城。

“验契”事件是殿龙第一次接触引起广泛反响的社会事件，这个事件给刚刚9岁的殿龙带来深深的刺激。家乡有着广阔的土地，农民们勤勤恳恳地耕作，为什么还是不能温饱度日、安居乐业？官府只知搜刮民脂民膏，根本不顾农民死活，农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竟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李殿龙少小的心灵里虽然对这些问题还没有答案，但从此萌生了对社会现实的思索，播种下了要追求一种新生活的幼芽。

就读新学堂

11岁时，殿龙转读刘集振华高等小学堂，这是辛亥革命后一批先进青年学生在刘集兴办的。广饶这样的高小也不过七八所，学生总共不过300多人，所以农家子弟能到高小读书受教育的并不多。当时，振





华高小算是广饶东南乡的最高学府，学校设修身、国文、算术、英语、历史、地理、音乐、体育、美术、劳作等科目，是完全不同于私塾的新式学校。李殿龙入二级预科班，同年录取的还有李延年、刘俊才（刘子久）、刘继孟、谢子才等。预科一年后转为正式二级学生，学习三年，毕业发给毕业证书，可报考省立十中、济南省立商专、工专等学校。^① 殿龙对原来有基础的国文、历史依然爱好，对地理、英语等新学科也兴趣盎然。他学习认真刻苦，各科成绩都很优异，每次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殿龙的叔父李集祺也是振华高小的一位先生，为了殿龙将来有出息，他对殿龙格外严格要求。有一天下午四点，应该是学生集中读书的时间，殿龙却在写作业。叔父看到，严厉地申斥他：人家念书，你不念，明天让你背给我听！他哪里知道殿龙是早已背熟了课文才写作业的。

第二天叔父把写着殿龙名字的签牌，从一把学生签牌中抽出来放在上面，上课时，第一个就抽到殿龙背书。殿龙毫不费力地把课文熟背了出来。叔父还有意识地为难他，要求殿龙再背时随时打断，然后从学过的课文中随便提一句让他接着背，这些都没难倒殿龙，他总是提到哪里就背到哪里。叔父这才确信殿龙并没有偷懒，反而是因为学习勤奋而又天资聪慧，比其他学生领先一步。凡是老师讲授过的课文，都已背得滚瓜烂熟。^②

有一次，全乡的学生在苏家庙举行算术比赛，李耘生以又快又准确的演算，获得这次比赛的头奖——一顶帽子。虽然只是小小的展露头角，殿龙在乡里已有了“才子”的美称。同学们佩服他，先生们也对他青睐有加，都说殿龙将来当不了庄稼汉，定有巴结（山东土语，有出息的意思）。

但殿龙并不是死读书的“书呆子”。从李家所在的西李村到刘集有两里地，相隔一条阳河。殿龙上学或放学都会留心观察沿途周遭的变化，把当天的所见所闻记在日记中。如看见老农在风雨中辛勤地耕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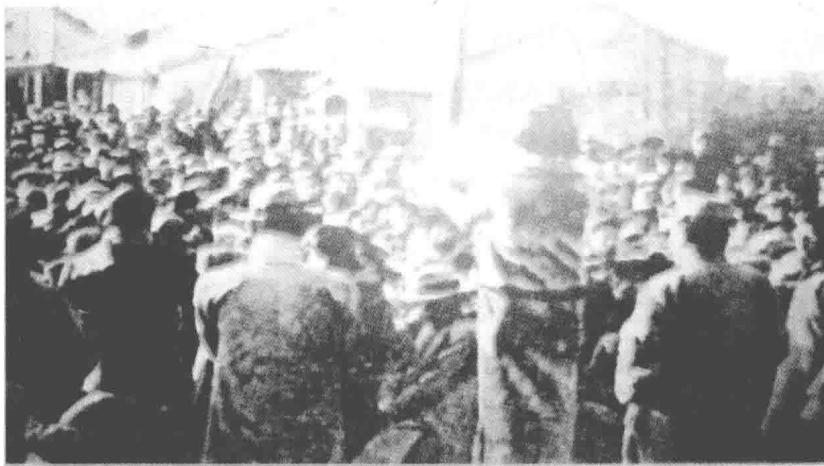
^① 中共广饶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广饶党史集粹》（内部资料），第460页，2013。

^② 李梦吉回忆，南京市档案馆4065-3-71。

看见阳河汨汨流淌，看见河水中的游鱼，看见田野尽头的日出、日落……往往不长的时间就记满了一本笔记。课余、假日他到裙带河边牧马，也随身带着书本，一边放牧，一边读书。殿龙把家乡田野给予他的养分，都深深地吸纳在脑海中。

这时正值辛亥革命后，各种思潮涌动的年代，学校中有些老师怀着开启民智、革新教育的抱负，在学生中传播着民主革命思想和科学精神。经过老师的教育和自己的思考，殿龙对一些问题有了自己的看法。

012



1919年5月13日，广饶青年学生集会响应五四运动

当时家中有人生病遭灾或遇到不顺心的事，长辈们请神问卜、烧香叩头是很常见的现象，似乎靠一炷香、几张纸钱就能逢凶化吉、消除三灾八难似的。当殿龙看到老人们虔诚地做这些事情时，总觉得这是不懂科学而产生的愚昧做法，就劝告长辈：“世上哪有鬼神？病了就该请医吃药，求神弄鬼，完全是自欺欺人，反而耽误了治病，千万信不得。”

在振华高小，殿龙还结识了刘集村的同学刘俊才（刘子久）。刘俊才比殿龙大4岁，出身农民家庭，读私塾时也是聪敏好学，被塾师称赞为“百行之才”。熟悉起来以后，两人时常一起探讨社会问题，相同的出身经历使他们很有共同语言，彼此结下深厚的友谊。

李耘生传
雨花台烈士传丛书

